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 尹 鈺

猶太人發明了diaspora一詞來揭示他們被迫流亡千年的痛史，中國人則發明了「洪洞縣裏、大槐樹下」這樣深具詩意的詞，來紀念他們被驅趕遷移的家族史。當代中國農民的命運又如何？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整部書都在敘述利益被侵害的移民，其上訪要求怎樣被政府官僚機構一次次扭曲、打消。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北京：三聯書店，2001）。

移民的痛和國家的傷

猶太人發明了diaspora（大流散）一詞來揭示他們被迫流亡千年的痛史，中國人則發明了「洪洞縣裏、大槐樹下」這樣深具詩意的詞，來紀念他們被驅趕遷移的家族史。中國人

有意過濾掉了那一份沉重和苦難，這是樂觀，還是無奈？「走西口」和「闖關東」的漢子默默無聞如涓涓細流注入到荒蕪的土地，但這默默遷移的「自由」掩蓋不住「湖廣填四川」這樣強橫的國家暴力所揭示出來的農民處境——一個「填」字，生動地表明，在歷史上的中國，農民被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隨意搬弄的命運。現在的中國農民命運又如何？

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以下簡稱《大河移民》）整部書都在敘述利益被侵害的移民，其上訪要求怎樣被政府官僚機構一次次扭曲、打消。這扭曲中有一種強大的邏輯在起作用，就是對於某一級政府官員來說，甚麼樣的問題是重要問題，甚麼樣的問題甚至都不用提上議事日程。邏輯中最核心的詞語，其實就是「臉面」，應星表示為「國家的光輝」。大河移民的故事後來終於有了一個「結局」，原因除了他們不屈不撓的抗爭外，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90年代國家已經開始啟動「三峽工程」，移民問題開始成為一個舉世矚目、影響到國家形象的「問題」。事情的結局是移民精疲力竭，國家則焦頭爛額，這是另一

種兩敗俱傷。這樣的故事並非大河獨有。

有兩個問題值得思索：為甚麼會這樣？問題如何解決？簡單從「土地制度」或「治理模式」來切入也許不得要領，這實際涉及的是大國的合理政治結構和國家觀念。這是本文試圖探究的問題。

故事裏的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三農問題」開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範式也被引進到中國，用來分析農村問題。然而有些敏銳的社會學者發現，這套理論範式難以解釋中國農村的某些現象。孫立平指出，中國農村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方面，國家在農村基層的組織結構在新時期經歷了一個不斷渙散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的意志卻在農村也得到了持續的貫徹和基本實現（典型的如計劃生育政策）。也就是說，事實展示出來的是一種雙重的情景。學者因而認為，以往的研究方法難以「進入」中國農村的「事實」，這迫使他们們尋找新的理論，這就是「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該策略「力圖將所要研究的對象由靜態的結構轉向由若干事件所構成的動態過程」，它「強調一種動態敘事的描述風格。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將研究的對象轉化為一種故事文本」（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廈門：鷺江出版

社，2000〕，頁8）。貫穿這種分析策略的分析手法則是後現代的「權力技術」分析。

視野和方法轉換之後出現了一幅全新的畫面：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是凝固在有關的正式規則和程式之中，而是存在於有關各方持續不斷的互動之中。在原來的理論視野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一種僵硬的二元關係，不是國家吞噬社會，就是社會包容國家。儘管有的學者發現這種思路的問題，轉而提倡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但仍無法擺脫這個整體性的「二元」關係。「過程—事件分析」則把國家和社會的實體性概念解構成具體的事件和人物，成為一幅幅生動的「流動的畫面」。比如，作為國家一方出場的，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政府概念，而是具體到了某一屆任期的某一位官員，甚至具體到了這位官員在事件過程的某一個時間點的某一條指示，以及這一條指示如何被捲入事件的各方做了不同的解讀。移民也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而是由一個個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場、不同處境、不同鬥爭策略的個體組成的集合。原來用作分析單位的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在新的理論視野中被分解為相互獨立而又彼此關聯的活動元素，這些元素的互動編織成一張廣闊的事件之網——人物是網的節點，事件的演進成了網的經緯之線，國家和社會二者之間的清晰界限，也就自然地消逝在這張充滿張力的事件之網中。

同樣，在經典的社會學、政治學範式中以靜態的結構性因素出現的官僚體制，也成為一種不斷運動

二十世紀90年代初，「三農問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範式也被用來分析農村問題。但社會學者發現，這套理論範式難以解釋中國農村的某些現象。因此他們改用「過程—事件分析」為新的研究策略。該策略強調一種動態敘事的描述風格，也即首先需要將研究的對象轉化為一種故事文本。貫穿這種分析策略的分析手法則是後現代的「權力技術」分析。

農民無論如何抗爭，他們的觀念中都有一根弦及無可置疑的事，那就是不能「危害國家利益」。他們質疑的僅僅是：國家補償標準是不是低了？土地測量準不準確？官員是不是按政策來辦？至於全部事件的出發點——國家的強行徵用土地，則完全滑出他們質疑的清單。《大河移民》成功解剖出中國農村社會的真實權力運作機制，為政治體系中最為軟弱的群體寫了一本深描式的傳記。

的網狀事件／過程。隨着故事展開，我們深切感覺到了官僚體制真實的存在，我們看到穿插在事件中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官員，一條條以文本形式出現的政策、指示，和一次次的「打消」問題的計謀、策略，以及官員們操縱的層出不窮的具有國家「背書」效力的「官腔」。這些因素都在「運動」之中，因為他們每一次出場時面目都不一樣。我們也看到「權力」瀰漫在事件的每一個場景和關節，以知識、政策等各種形式肆無忌憚地支配着行動者，而行動者也不得不爭搶各種「話語」以獲取「權力」。

《大河移民》是目前中國知識界運用權力技術分析方法最為成功的作品之一，這種成功不只體現在它向中國的讀者深刻解剖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真實權力運作機制，也體現在它第一次如此嫻熟地、集中地運用權力分析技術，為中國政治體系中最為軟弱的群體寫了一本深描式的傳記。

問題俱在，道路全無？

然而，《大河移民》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張只可觀望、無法措手的事件之網，指望在這張網中尋找某種確定性是徒勞的，因為「確定性」恰恰是作者採取的這種分析策略從一開始就試圖避免的。這種不確定性由這種方法論的後現代取向所決定。

於是，作者的「敘事」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農民的處境，但從中我們卻看不到出路。跟隨作

者的筆觸，可以看到一幕幕事件如奇峰突起般展開，但看不到故事會有一個「終點」，一個讓移民們真正滿意的「解決」。作者運用嫻熟的「權力技術分析」解剖刀，在「日常生活」的表面飛舞，卻並沒有切割到中國政治體系中最具有支配力的權力關係。

我們看到，農民無論如何抗爭，他們的觀念中都有一根弦，那就是不能「危害國家利益」。當他們以國家政策作為與官員抗爭的依據時，官僚的「擺平術」之所以能夠湊效，就是有這根無形的觀念之弦為農民的行動畫下了範圍。沒有人，包括作者自身，質疑這種無所不在的「國家利益」雷區的合法性。為甚麼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就可以任意徵用剝奪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被徵用之前和之後，為甚麼他們根本沒有談判的資格？「國家」和官員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農民同樣認為這是無可置疑的，他們質疑的僅僅是：國家補償標準是不是低了？土地測量準不準確？官員是不是按政策來辦？至於全部事件的出發點——國家的強行徵用土地，則完全滑出他們質疑的清單。

在關於「國家利益」和「政府」的觀念中，隱藏着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一貫的「統治」觀念：官（國家的代表）與民，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既然是統治，自然就有順民、刁民。這種觀念結構不改變，中國的官民關係也不可能轉變。在此，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甚麼「國家利益」不能以真正的「人民利益」為起點？如果農民開始將他們質疑的目光投注到「國家利

益」之上，官員講着「國家利益」時也不再如此理直氣壯，則「順民」和「刁民」這一對概念就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形象高大的「公民」！

作者在意識形態批判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反思上止步不前，這也許是因為作者受制於後現代方法論的某些缺陷。許多後現代理論提倡一種決裂於傳統理性主義政治的唯美政治，不再把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對虛假觀念的克服作為政治的基礎，不再像傳統理性主義政治那樣以務實的態度對待「權力」這一嚴肅事務。除了意識形態的制約，宏觀的政治結構同樣對上訪事件中的微觀／日常權力關係產生着巨大的引力場效應，而這一點在書中的「敘事」中很少體現出來。這同樣是後現代方法論「屏蔽」的結果。

政治學中有一個重要術語：政府的回應性。官僚主義最典型的特徵就是缺乏回應性。西方民主政體靠着落實「人民主權」來解決官僚主義痼疾。中國現有體制無法有效解決官僚體制中的信息溝通問題，也無法有效解決對各級官僚的制約問題，這是由目前政體的特性決定的。因為威權主義政體最為關注的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在這種政體中，政治合法性是通過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來取得，而政治穩定卻無疑需要控制信息流量，不管是官僚體制內部的信息流量還是官僚體制和人民之間的信息流量，國家都必須嚴格控制。移民上訪中面對的大問題——官僚機構對他們的信息封鎖——是政體特性決定的，

他們可以通過封鎖營造暫時的穩定局面。

然而，當信息封鎖被移民一層層突破，他們仍然可以「不回應」，這又是為甚麼？在應星的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意象，就是「上面」、「中央」、「北京」。為甚麼上訪的農民都將他們的上訪終點落在了「北京」？為甚麼基層官員只有在將「上面」牽動之後，才真正開始進入解決問題的「狀態」？探究這個問題，就必須考察中央地方關係。

「中央—地方」的二元對立概念也是一種「中心—邊緣」對立觀念。中央是主體，地方是從屬。地方從中央而不是直接從百姓取得其合法性。中國的國家—地方關係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契約關係——委託—代理關係，從而在國家（中央）—地方關係中產生了經濟活動中常見的代理人和委託人之間的矛盾。

我們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中看到，中國官員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繫於上級提拔，而提拔理由則至少表面上是轄區內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這種制度促使官員在穩定成為「問題」時投入更多資源來保持政治穩定。官與民、中央與地方之間這種觀念結構與權力結構，使得農民只有向上尋求制約基層官員的力量，此外別無出路，而農民真正有效的手段也只有一條，那就是製造「不穩定」。大河移民上訪的曲折故事，不管它的細節浸潤着多麼大的偶然性，其大致經過和最終結局卻早就由中國的政治體制結構擬好了「大綱」，修改修改就可以在別的地方一齣齣「上演」。

作者在意識形態批判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反思上止步不前，這也許是受制於後現代方法論的某些缺陷。許多後現代理論提倡一種決裂於傳統理性主義政治的唯美政治。因此，宏觀的政治結構對上訪事件中的日常權力關係所產生的引力場效應，在書中的「敘事」中很少體現出來。這是後現代方法論「屏蔽」的結果。

為了尋找出路，應該反省我們觀照世界的理論視野。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看到甚麼取決於我們如何去看，用甚麼樣的理論去看。「要想恰當地理解目前的歷史時刻，就需要一種系統的、包容性的社會理論，這種理論必須具有古典現代性理論……的那種實踐意向。一種批判社會理論既要提供關於當前時刻的理論，同時還要對當前社會的形成過程作歷史性的說明。它應……將理論建構同經驗研究相結合，同

時還應將微觀理論和宏觀理論統一起來。」(貝斯特[Steven Best]、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著，張志斌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377)但這種前景是目前的後現代理論無法提供的，相反，現在後現代主義者開出的反對宏觀理論與宏觀政治的處方，「具有癱瘓理論與政治之危險，應予以放棄」(同上書，頁381)。

新社會史首先是歷史

● 瞿 駿

在叫好者看來，《事件·記憶·敘述》一書展示了新社會史的勃勃生機，而對批評者來說，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西化的語言系統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某位書評作者說新社會史就像是一個辮子已剪、長袍未去的假洋鬼子。筆者以為，新社會史首先是歷史，歷史論文有其學術規範和標準，如資料是否扎實等等。



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事件·記憶·敘述》可能是一本頗為叫好的書，但也可能是一本招來不屑和批評的書，其命運或許會類似於《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和兩大本極厚黑的《新史學》。在叫好者看來這本書展示了新社會史的勃勃生機，收錄的一篇序言、九篇研究論文和三篇研究動態評述